

辽宁大学智库 简报

2024 年 第 35 期

(总第 64 期)

辽宁大学中国开放经济研究院

2024 年 9 月 16 日

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启发展新征程

余森杰

中国的发展是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最确定的因素和动荡世界中的定海神针。现在全球的经济增长在看中国,中国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所以,这解释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个国家非常重视中国的原因。第一,改革是永续的发动机,改革是动力;第二,开放是必由之路,开放是法宝;第三,党的领导是个根本保证。首先,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我国一直通过不断地开放促改革,改革促发展,实现这样的良性的循环。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必要条件,但其实不见得是充分条件。为什么这么说呢?换言之,其他国家有没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许多国家都有的,只不过有的成功有的

本文根据辽宁大学校长余森杰于2024年8月2日接受中国网《中国访谈》专访的内容整理。

不怎么成功,中国是改革开放做得最成功的。我国取得了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包括脱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必须强有力,才能保证各项政策的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要不然这个政策制定得再漂亮,最后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是不可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所以,改革是动力,开放是法宝,但前提是强有力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保证,它可以保证政策的落实“纵向到底,横向到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其兴可待。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的主题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改革”,一个是“中国式现代化”。从三中全会的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可以看到,大大丰富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一个认识。而中国式现代化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次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一样地强调了这“五个现代化”,而且更加深化。同时,除了这五个方面以外,还拓展到另外十个方面,换言之,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上讲,涉及到15个方面。尤其是《决定》为中国未来进一步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这相当于中央给我们改革开放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进行“把舵引航”。其中最为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改革,怎么样深化改革,这一点可以说体现在《决定》中的方方面面,表现得特别清晰。而且其中的一条主线就是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这个链条也是非常清晰的。《决定》也列出了时间

表,包括2029年和2035年(的时间节点)。今年是2024年,五年之后,换言之,就是到了“十五五”规划“收官”的时候,我国要实现怎样的目标,三中全会也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晰。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的表述中有两个词特别关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这两个词体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其实效益最大化,就是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它是利润最大化以及成本最小化的结合。如何实现成本的最小化呢?就是我们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包括隐性、显性成本。三中全会《决定》中进一步深入地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以及需要做的工作。比如在有为的政府方面,《决定》特别强调政府治理,实现良治和善治的结合,这点特别重要。它相当于是把政府治理放到国家治理的大范畴中。国家治理是一个更全面的概念,除了政府治理以外,还有社会的治理等等。其中政府治理,良治和善治成为一种目标。如果再具体一点,有为政府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宏观政策,除了财政政策以外,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更为宽广,包括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换言之,这也和我们之前的金融强国战略,包括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保证在“管得住”的同时能“放得活”。“放得活”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分为几个方面来实现:一是要素市场的统一。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中对要素市场的统一做了更全面的解释。之前有错误的观点认为统一就是计划,计划

就是反对市场。这里对统一讲得很清晰,统一的对立面是分割。统一是指市场基础设施规则的统一。这是第一点。二是监管的统一。三是基础设施连通的统一。所以,它对统一讲得很清晰。再进一步,说到要素市场,哪些要素需要统一呢?基本上有几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能源、数据、交通等要素的统一。例如数据市场的统一,我国现在强调数字经济,强调打造各类数字场景,这是很好的出发点。但事实上,目前一些地方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数字并没有完全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比如说,政府的数据以及社会的数据,政府各个部门的数据其实并没有完全打通,《决定》直接提出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要打通,然后实现数据的共享,这就是统一的一个方面。还有对于资本的统一、人才的统一,《决定》中也讲得很清晰。一方面是按照价格统一,比如资本的价格就是利率,如果说雇佣人才的价格,那就是工资或者报酬。对于这个价格,《决定》提到必须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这就相当于对我们以前所讲的“按劳分配”更高一个层次的表述。那么,体力劳动比较容易按照按劳分配决定报酬,那么如果是脑力劳动者,好像不能够简单地按劳分配吧?那按什么来分配呢?按照贡献,按照其对社会的贡献来确定。

《决定》中也特别强调了要推进城乡融合,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那么人才的流动,户籍是绕不过去的一个点。所以,这也是一项很重要的改革,我国的改革涉及方方面面。这是关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第一点,就是要素市场的统一。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最终的目标是商品和服务的统一,相当于要素市场统一是起点,终点是商品和服务的统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我国内贸

和外贸产品要实现“三同”，即“同质、同线、同标”，同等质量、同条生产线、同一标准。怎么样来实现呢？这就需要基础设施的联通，其实就是降低消费成本。降低消费成本又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形的物流成本，通过更好的基础设施服务，例如“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以及通过各种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降低有形成本。隐形的成本是什么呢？比如说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还是不好，这个就是隐形的成本。比如有些地方明明基础设施很好，但如果软性的营商环境不好，也会影响这个地方的发展，因为他的隐性成本过高。所以，降低隐形的成本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因此，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个桥梁，起点是要素市场的统一，终点是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统一，过程是设施联通以及生产要素、消费成本的降低。那么，怎么样保证呢？就是统一的监管，是国家制定的规则、标准统一的监管。要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需要在政府的领导之下推进市场监管的工作。另外一点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来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我国现在的目标就是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但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来保证高质量发展呢？最主要的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二、培育“三位一体”的新质生产力

三中全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的发布，培育新质生产力被视为一个“三位一体”的系统工程。首先是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其次是生

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第三是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在“技术、要素、产业”三位一体中，技术是最为关键的。能否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能否实现技术革命性的突破。那么，如何实现技术革命性的突破？其源泉来自于创新。创新通过研发实现，研发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性研发或产品创造，即产品从无到有的过程，这是一种从0到1的飞跃，或称为产品广度的创新；另一种是深化，即对已有产品的改进，例如华为手机的代际更新，这属于从1到N的深化。因此，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最重要的是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三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明确指出，“必须允许或引导、鼓励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培育“耐心资本”，这是资本创新性配置的体现。除了资本，人力资本的提升也至关重要。那么，人才从何而来？需要学校培养具有通识性和博雅性的人才，以适应各行各业的需求。因此，高校应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善于学习的人才，这也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同时，企业在岗培训也十分重要，以便在职人员能够结合行业进一步发展。因此，除了高校的通识教育外，企业的在岗培训同样不可或缺，以提升我国的人力资本。

新质生产力涵盖三大类产业。第一类是传统产业，即老字号产业。传统产业如何转型升级？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数智化，即数字化和智能化；二是绿色化。可以看出，绿色化与数智化是传统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的关键。第二类产业是“原字号”，即许多原材料产业。这些产业如何培育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拓宽附加链条，确保市场上销售的最终产品不仅仅是附加值较低的原始产品，还应包括经过深度加工的高附加值产品。第三类是未来的新兴战略性产业。所谓未来产业、新

兴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指的是八大产业：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代表着我们发展的八个方向。这些领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所涉及的新模式、新动能和新场景。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指标。要实现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全要素生产率必须稳步提升,这与培育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因此,培育新质生产力确保了科技的创新与发展,而科技的发展又保证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进而为高水平的安全提供保障。这一链条应当如此运作。此外,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新质生产力。举两个例子:首先,苏州通过产业集聚(如昆山、太仓)与外资引进相结合,差异化发展,成功培育新质生产力。其次,辽宁省打造的20个产业集群,各城市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产业。

三、推动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双向促进

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二者缺一不可,而且是不可偏废的。只有高水平的安全才有高质量的发展,或者说高水平的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反过来说高质量的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保障。现在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面临着异常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复的国内发展任务,所以,对于安全,我们的理解也更为深刻。安全一般指五个大方面的安全,一是国防的安全;二是产业安全,包括产业链的安全;三是能源安全,我国的核心能源能不能自给自足,能不能保证我国产业的安全;四是生态安全,我国能不能保证生物的多样性;第五,粮

食安全,我国能不能牢牢地把饭碗抓在自己的手中。所以,这“五大安全”特别重要,高水平的安全是核心。

高水平安全与高质量发展二者缺一不可,且互为前提。只有高水平的安全才有高质量的发展,或者说高水平的安全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反过来说高质量的发展是高水平安全的保障。当前,我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的国内发展任务,因此对安全的理解愈发深刻。安全一般涵盖五个方面:一是国防安全;二是产业安全,包括产业链安全;三是能源安全,确保我国核心能源的自给自足;四是生态安全,维护生物多样性;五是粮食安全,确保牢牢掌握自己的饭碗。这五大安全至关重要,高水平安全是核心。

高水平安全与低水平安全的区别在于,固有观念中通常将安全等同于稳定,并将“稳定”视为保守。但安全并不等于保守。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安全与发展的关系:现代高铁的安全性远高于过去的绿皮火车,现代SUV的安全性也高于30年前的拖拉机。因此,我们应反思,在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踩油门”而非“踩刹车”。如果“踩刹车”过于谨慎,发展将受到限制,安全也无从谈起。这就是低水平安全,其实是最不安全的。因此,我国应追求高水平安全,而实现高水平安全的路径是,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稳中求进”是首要原则,而“以进促稳”则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理念。只有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确保高水平安全。

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发展?必须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到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生特征,绿色是普遍形态,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根本目的。通过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保持5%的年经济增

速,使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每年保持在30%左右,唯有如此,才能确保高水平安全,这才是对“以进促稳”的正确理解。

四、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中全会《决定》提到,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从立法、扩大市场准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到完善融资支持和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改革部署,为民营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少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二是“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关于国有经济的发展,《决定》指明了清晰方向。首先,国有经济应强调主业,尤其在涉及国家安全(如国防、国计民生、应急系统等领域)时,应加强国有经济的作用。《决定》对电信、铁路、能源、水利等行业进行了更详细的部署,明确自然垄断性行业内部的自然垄断性业务应独立经营,而具有市场竞争性的业务则应实行市场化管理。换言之,自然垄断性行业的某些环节也应实行市场化管理。

市场化管理意味着市场化准入和竞争。谁来进入市场?欢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因此,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表述也更加清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家熟知的“56789”即非公有制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可以说,非公有制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决定》在要素准入和退出方面进行了部署,强调要素市场的准入,同时提到市场的退出,并计

划制定非公有制经济促进法,以法律形式保障“有恒产者有恒心”。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拥有平等获得要素资源的权利。《决定》提出要确保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土地获取、贷款申请和数据要素获取等方面享有均等权利,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助于有效缓解非公有制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决定》提出要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欢迎非公有制经济参与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此外,《决定》更加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及各类产权制度的完善。“两个健康”(即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健康成长)也极为重要。非公有制经济的主要推动者是民营企业家,因此《决定》中强调弘扬企业家精神,明确保护企业家的私有产权。

五、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

三中全会对财税方面的改革也作出了具体部署。第一个方面是央地关系,最重要的是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原则。第二个方面是相对扩大地方财力的自主权。若事权属于中央,则由中央支出,同时扩大地方财政收入,税收收入需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因此,通过财税体制改革来保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了效率,而公平则关乎社会的公平,通过这样的体制进行保障。

这里涉及到几个方面的改革,第一个是直接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决定》中提到这一点,但未详细说明个人所得税具体如何改革,因为一切仍在探索之中。例如,目前的累进税制是全球普遍采用的趋势。

那么,累进税制各个税段的设置是否合理?是否存在调整空间?当然,我国需要保障一定的财源,以集中力量办大事。那么,财源从何而来?应从间接税方面入手,例如将消费税后移(征税环节转移到消费环节,在销售环节征收消费税)。此外,消费税的税率也可适当考虑调整,因为消费税有几档,对不同产品征收消费税,对于奢侈品可以适当提高,而对一些必需品则可以适当降低。无论升高还是降低,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都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确保国家有充足的财源,保证高质量发展,同时维护社会的公平。

另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合理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支持范围。换言之,我国有特别国债和地方专项债,现在需要进行配套措施。例如,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可以配套按照8比2的比例进行,即中央国债占80%,地方占20%。此外,地方专项债的配套可以作为资本金,这也是《决定》中强调的,扩大地方专项债的支持范围,这是我国改革的一个方面。如何更好地发挥地方主体能动性,激发他们的活力,从这方面来看,地方专项债应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当然,也需要恰当地对共享税的比例进行再研究,比如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这些比重是否最优化都值得商榷。换言之,如果我国要适当增加地方税收,这些税的共享比例均可进行进一步优化和调整。

六、持续推动全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三中全会的《决定》特别强调我国要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而平等有序是中国坚持的重要原则。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平等有序的世界

多极化是上层建筑,那么经济基础就是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只有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才能保证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又如何实现?中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决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五大新发展理念也指出开放是必由之路。我国的目标是形成一个全面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新格局包括三个方面: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首先,开放的范围更大。例如,外贸方面,去年外贸规模超过41万亿人民币,而今年上半年的外贸规模已达到21万亿人民币,下半年的外贸一般比上半年更多,因此,今年外贸规模至少可达43万亿人民币,显示出稳步提升的趋势。

其次,开放的领域更宽。关于外贸,不仅限于商品贸易,还包括服务贸易,我国要提升服务贸易,三中全会对此进行了部署。不仅是制造业引进外资,服务业也要逐步开放。《决定》中强调服务业的逐步开放,并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对外投资方面,三中全会提出企业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我国不仅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让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实现民心相通。中资企业不仅要在东道国“挣钱”,还要为当地的发展贡献力量,让当地居民真正受益,这就是民心相通。通过实际行动,通过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提升当地的经济水平,一方面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提高东道国的经济水平。更宽领域的另一个表现是数字贸易和绿色贸易,我国“新三样”的出口以及碳捕捉技术的出口,去年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第三,开放的层次更深。我国正从要素型的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过去,中国是劳动力丰富型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衣

服、鞋帽等。现在,我国的资本逐步丰富,开始不断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奇瑞汽车等,出口至全球各地。要素型的开放正在转向制度型的开放,具体体现在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四个方面的开放。一是规则开放。我国是世贸组织的成员国,应融入全球经贸规则。二是规制开放。我国有自身国情,因此存在一些特殊的例外条款,这称为规制。三是标准开放。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准,例如汽车产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四是管理开放。企业有自己的管理要求。我国要构建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目标是实现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深层次。具体而言,首先要实现出口目的地的多元化,不仅瞄准欧美等发达国家,还要向新兴工业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开放。因为开放不仅是向他们出口产品,还要从这些国家进口各种产品,贸易本质上就是自由贸易。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开放既是利己又是利人的举措,更进一步彰显了我国扩大开放的信心、诚意和力度。

七、强化教育、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

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和战略性支撑,而高校是教育、科技和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决定》也对这些方面的改革进行了部署,提出要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首先,人文社科和理工类学科要协同发展,三中全会《决定》中也特别强调了这点。其实这对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培育新质生产力,需要各个产业的人才,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有交叉学科、新兴学科、未来学科,所以这方面的人才才是国家所需所缺的高端人才,我们需要培育。另一方面,同为重要的是,我们要保证人文科学和

理工科学两方面相结合。换言之,这可能要改变过去“只重理不重文”的现象。因为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特别重视理工类人才,以前有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全中国”,后来发现学好数理化,可以走遍全世界。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讲,当一个经济体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科学越来越重要,好比说《决定》的总体设计,这就不是STEM(Science 科学,Technology 技术,Engineering 工程,Mathematics 数学)的内容了,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思维的宏观性设计。所以,这是我国未来高等教育中需要平衡或需要注意的一点。发达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很高,他们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也非常高,事实上我国也一直在强调这点。所以,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培育、培养,和理工科人才的培养一样重要。

八、健全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

《决定》中提到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为了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我国需要妥善处理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或称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从哲学或逻辑角度看,这包含三种可能:一种是城镇化发展较快,城镇化快于工业化;另一种是城镇化慢于工业化;第三种是协调发展。前两种情况中,若哪一方发展过快或过慢,都会带来不良后果。例如,有些国家工业化滞后,城镇化过于超前,如南非,导致许多人涌入城市却找不到工作,只能居住在贫民窟,社会容易发生动荡。反之,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也会产生不良后果。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发

展较快,但城镇化相对滞后,造成劳动力需求大但供给不足,必然导致工资上升,进而影响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最终影响整个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协调发展是最佳选择,这也是三中全会特别强调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的原因。

此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城市化”有所不同,反映出我国要打造“大国大城”的模式还是“大国小城”的模式。“大国小城”的模式并不是否定城市化,而是强调先发展城市群。目前,我国有五大城市群,包括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城市群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产生由中心向外围外溢的作用,从而促进城镇化。因此,我国特别强调县域经济的发展。针对县域经济,三中全会指出了一个方向,这也是解决户籍人口问题的办法。我们不再根据居民身份证或户口本上的户籍来决定居民在该地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依据居民的常住地。

九、稳步推进延迟退休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决定》在民生领域也有大量涉及,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原则。特别是延迟退休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成为民生领域的重要内容。延迟退休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全球中长期的共同挑战。可以看到,人口老龄化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日本、韩国早已进入这一阶段,实际上,美国也面临类似情况。因此,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我国的平均寿命不断提升。对于许多人来说,60岁仍然较年轻,退休后应考虑如何安排生活。因此,三中全会特别强调了银发经济。银发经济不仅仅是挑战,更是机遇。从财

富分布来看,中年人的收入通常最高。

因此,当人们在60岁退休时,往往处于财富的顶峰。此时,他们可能选择旅游或参与各种活动,也有人会选择继续接受教育,老年大学因此变得愈加流行。未来,高校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青少年数量减少的挑战,开设老年大学,旨在为步入老年或60岁以上的人群提供学习机会,以寻求学习的乐趣和心灵的平静,促进老朋友之间的交流。如果退休后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便能让人们去做很多事情。因此,银发经济更多地被视为机遇,尤其是对教育产业、旅游产业等多个领域而言。其次,延迟退休的合理性也得到了认可。《决定》中使用的两个词非常准确——自愿和弹性。如果您不愿意延迟退休,没有人能够强迫您,这两个词刻画了延迟退休的精髓。事实上,60岁的人大多身体状况良好,因此,有些人愿意延迟退休,且在单位中确实是中坚力量。因此,三中全会为延迟退休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同时,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在于生育意愿的下降。生育意愿的下降既有经济因素,也有文化因素,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当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积极应对这一挑战?我国通过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这“三育”的成本来应对这一问题,这一点尤为重要。例如,为年轻人提供产假,产假不仅应提供给女性,也应提供给男性,以形成更加合理的体系。因此,三中全会对民生的重视体现在各个方面。

作者简介:余森杰,男,汉族,1976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戴维斯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监委特约监察员,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辽宁省人大立法委委员,辽宁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是联合国国际经济学会(IEA)会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9年)、首届青年长江学者(2015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财政部“中美研究智库联盟”理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名誉教授、俄罗斯联邦财政金融大学国际顾问理事。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社科联副主席、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全球经管类前1%高被引论文经济学者,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奖”的华人学者。被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参事室和多个地方政府聘为专家顾问,被专门邀请到联合国总部作中国经济发展报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为国际贸易和中国经济发展,曾在 *Economic Journal*、*Review of Economics & Statistic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国内外顶级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0篇,出版中英德文专著、教材、时评随笔27部。任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副主编,商务部《国际贸易》执行主编,《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日本研究》主编、《长安大学学报》执行主编。曾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次)、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张

培刚发展经济学奖,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五次)。代表著作《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获“刘诗白经济学奖”、“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全国贸易发展研究奖”、“中国青年经济学家奖”、“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奖·成就奖”等。

辽宁大学智库简报编委会

策划:潘一山 主编:余淼杰

编委:李宇鹏 史保东 霍春辉 仇焕广 李淑云 姚树洁 王振宇
李艳枝 白永生 崔 铮 尹如玉

编辑:赵子龙 校对:李楠楠 联系方式:024-62602446

本刊声明:所刊文章属作者个人见解,不代表编辑部观点。

请把领导批示和转载情况反馈编辑部。